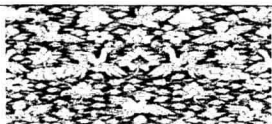


竹林名士

的智慧與詩情

江建俊 主編





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

主編◎江建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江建俊主編。

——初版。——臺北市：里仁，2008.07

面；公分

ISBN 978-986-6923-40-1（平裝）

1.六朝文學 2.魏晉南北朝哲學 3.文學評論

820.903

97012770

· 本書經編寫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江 建 俊 主 編

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

校對人：作編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02）3393-7766

網站：<http://lern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 978-986-6923-40-1（平裝）

序

江 建 俊

竹林七賢以任誕、簡傲的形象出現，而真實的一面則為超世絕群，對宇宙自然一往有深情，也是最有自覺意識，是時代的清醒者。從七賢中的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都嚮往大人境界；山濤、劉伶、王戎、嵇康之工於書畫；阮籍、阮咸、嵇康的音樂造詣，可謂登峰造極；而嵇康、阮籍、向秀、劉伶又有詩文作品傳世，是引領時代思潮的思想家、文學家，文藝導養其神氣，宣和其情志，也傾注其思致。他們冷眼放觀時局，也堅忍的捍衛自己的尊嚴。他們或嚴氣正性，或應變順和，或與時俯仰，或自晦曲全，或貞素寡欲，或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或嘯歌長吟，徬徨焦灼。其生命如外野孤鴻，臨深履薄，由於嚐盡生存的苦澀，故心靈的拓境忒深，人格更稠適而上遂，深具玄心與洞見，此所以近年來探索七賢之論文層出不窮之主因。何況處今之世，有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的現實環境之壓力，舊有價值的崩解，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有識之士都有「過於喧囂的孤獨」，在自覺微不足道的角色中，有著不平之氣蓄勢待發，於是竹林七賢的鮮明形象重被召喚，用以投射一己的遭際。

本人在開設《世說新語》一課及閱讀《晉書》四十九卷時，每被竹林七賢土木形骸，不受禮教規範、嘯傲山林的任達所吸引，遂通讀七賢之遺文，檢視七賢之形姿風貌、生命情性，完

成三十餘萬言之專著，以作為升等教授之論文，此為 1990 年之事。其後更調查嵇、阮集的善本存目，收集七賢的相關文物，其他各種專著、期刊論文或碩博士論文，升等論文等皆加以搜羅存錄，還編成索引。然平日教學、指導研究生、評審論文、執行其他計畫及許多學術服務工作，十分繁忙，遂鮮有新作發表。幸去年向國科會申請三年期的「竹林文化的形成、流播與影響——以中、日、韓為考察對象」研究計畫，遂得董理舊業，乃於 2007 年 12 月 16 日假成大中文系舉辦了一場「竹林文化」的專題研討會，獲得學界之熱烈支持，共提出九篇學術論文。然因其中以嵇康、阮籍的篇章較多，未得「七賢」之全帙，於是作第二次邀稿，始得以完整的展現七賢之學行。其如：馬良懷〈山濤——一個停留於正始時代的竹林名士〉、朱曉海〈論向秀〈思舊賦〉〉、王曉毅〈向秀研究拾遺〉、曾春海〈嵇康的山水美感與憂慮情懷〉、江建俊〈論嵇康的「出位之思」——從「師心」談起〉、黃潔莉〈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美學〉、盧桂珍〈阮籍生命底蘊之蠡測〉、姚彥淇〈本有濟世志——論阮籍的黃老之心〉、葉常泓〈隱蔽如謎的英雄情結——阮籍仄議〉、渠曉雲〈飲酒與曠達：劉伶析論〉、紀志昌〈阮咸析論——從七月七日曬衣未能免俗的幾層意義談起〉、林萃菱〈「苟媚取容」乎？「自晦求全」乎？——王戎情性與禮法橫決探析〉、林佳燕〈剛腸嫉惡、依違兩可、玩世不恭——從諧隱文談竹林七賢中的三種應世姿態〉、何善蒙〈大陸竹林七賢研究綜述（1900—2007）〉等篇章，其特色為能從新穎的角度出發，提出深刻且不同流俗的觀點，賦予七賢更新且多元的學術觸角，也能給予往後從事竹林學之研究者，有更精入的領略；而收錄大陸對竹林學的研究現況評

介，可提供學界之參考比較。

作為追求自由、回歸自然之符號意義的七賢，其影響性及於中、日、韓、越等亞洲各地，竹林精神之所以能穿越時空，其流衍及影響之所以與日俱增，幾具有「竹林意象」之豐富內蘊，是以竹林學的研究乃刻不容緩之事，期能透過此書的出版，讓更多學者注意到七賢之事蹟，並拓深之，得為「竹林學」之成立盡一份心力。

近來在大學通識課程中已有開設「竹林七賢」這門課者，從選修爆滿，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而大學開設「魏晉玄學」、「嵇阮詩」；研究所開設「竹林玄學」者亦所在多有，蔚成一股探討七賢生命情調之風潮。而日本、韓國之學者，也普遍對七賢產生興趣，此從專書的出版及學位、學報論文的不斷出現，還有各種文物的爭奇鬥艷，可窺一斑，「竹林學」可謂已隱然成型，故此次專題研討會的召開及論文集的編纂，將可達到推波助瀾之功。感謝里仁書局徐秀榮先生之高瞻遠矚，贊助學術，於此，謹致誠摯謝忱。是為序。

於成大中文系 二〇〇八年四月廿三日

目次

序	1
山濤——一個停留於正始年代的竹林名士	
-----馬良懷	1
論向秀〈思舊賦〉	
-----朱曉海	13
向秀研究拾遺	
-----王曉毅	55
嵇康的山水美感與憂慮情懷	
-----曾春海	79
嵇康之「出位之思」——從「師心」談起	
-----江建俊	95
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美學	
-----黃潔莉	137
阮籍生命底蘊之蠡測——何疾而為顰？	
-----盧桂珍	205
本有濟世志——論阮籍的黃老之心	
-----姚彥淇	241
隱蔽如謎的英雄情結——阮籍仄議	
-----葉常泓	269
飲酒與曠達：劉伶析論	
-----渠曉雲	321
阮咸析論——從七月七日曬衣「未能免俗」的幾層意義談起	
-----紀志昌	339

「苟媚取容」乎？「自晦求全」乎？

——王戎情性與禮法橫決探析

-----林 萃 菱---365

剛腸嫉惡、依違兩可、玩世不恭

——從諧隱文談竹林七賢中的三種應世姿態

-----林 佳 燕---391

大陸竹林七賢研究綜述（1900—2007）

-----何 善 蒙---427

山濤——

一個停留於正始年代的竹林名士

馬 良 懷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提 要

在魏晉名士發展史上，山濤屬於第二階段裏的人物，即竹林名士，然而，他與同為竹林名士的嵇康、阮籍等人相比較，卻有很大的不同。山濤是個滯後的人物，雖然他身入竹林，但心在正始，無論是思想還是在行為方式上，山濤都更接近於第一階段的正始名士。

在正始名士身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追求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在哲學的層面上爭辯、探討天人關係及萬物本體，而于「清談玄理」中顯一「逸氣」；二是熱衷於世俗政治，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努力破除「術兼名法」的高壓統治，建構一個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並在現實生活中擯棄傳統禮法，交遊結社、聚會玄談，追求一種無拘無束、輕鬆自由的生活方式。這些特點在山濤的身上都有充分的表現。

山濤由於家世背景的原因而無緣進入正始名士的群體，而歷史的機緣巧合，又使山濤這位竹林名士成了正始名士思想極重要的繼承和實踐者。

關鍵詞：山濤、名士、正始、竹林

魏晉之時，名士輩出，與英雄一道風風火火地佔據著那一時代的歷史舞臺，酣暢淋漓地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紛呈的活劇，為歷史留下一個個鮮活感人的形象，山濤就是其中的一位。

關於名士，今人牟宗三在《才性與玄理》中揭示說：「『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清則不濁，逸者不俗。沉墮而局限於物質之機括，則為濁。在物質機括中而露其風神，超脫其物質機括，儼若不繫之舟，使人之目光唯為其風神所吸，而忘其在物質機括中，則為清。神陷於物質機括中為濁，神浮於物質機括之上為清。神有成規成矩為俗。俗者，風之來而凝結于事以成慣例通套之謂。」這是對名士的一種較為抽象的概說，具體到魏晉，牟氏細說道：「所謂名士，究其何而名？惟在因顯一逸氣而名。逸氣雖無所附麗，而亦有表現。其表現在清言，清談。故其為名士是因清言清談而為名士。又，清言固有所言，清談故有所談，其所言所談為玄理。故其為名士亦因清言玄理而為名士。又，逸氣之表現亦在『青白眼』，亦在任放，不守禮法。故其為名士亦因生活曠達而為名士。名士之名不是名節、名檢之名，亦不是名實之名。名節、名檢、名實之名，皆有所附麗而在一格局規範中顯。而名士之名，則無所附麗，亦不在格局規範中顯。是以其為名也，亦只是其逸氣之一點聲光，全由遮顯。」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今河南武陟西）人，東晉袁宏將其列在魏晉名士發展的第二階段即竹林時期。《世說新語·文學注》曰：袁宏作《名士傳》，「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而事實上，山濤

也的確是身置於竹林名士之中，與嵇康、阮籍、向秀等人關係友善親密，《世說新語·任誕》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玕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常常將山濤與放任曠達，不守禮法的嵇康、阮籍等人進行比較，認為山濤與他們相去太遠，缺少名士氣，甚至覺得有點俗，因此歷來評價不高。然而，當我們把山濤放在魏晉名士的發展過程中去考察，便會對山濤有一種新的認識。可以說，山濤是個滯後的人物，雖然他身入竹林，但無論是思想還是在行為方式上，山濤都停留在前一階段，更接近于正始名士。

考察魏晉名士發展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儘管竹林名士與正始名士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但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

由「清談玄理」顯「逸氣」而為名士，是從正始年間開始的。當時的名士談鋒甚健，他們以談會友，見面就相互剖析爭辯，由傳統的煩瑣、呆板、平庸的形象比附邁進形而上的抽象思辨王國，在哲學的層面上爭辯、探討本末、有無、體用、名理玄遠等重大問題。《世說新語·文學》曰：「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但正始名士並不只是在形而上的王國裏清談玄理，他們對世俗政治也頗具熱情，無論是何晏、王弼、夏侯玄，還是與簇擁在他們周圍的那幫青年才俊，都是正始年間活躍的政治人

物。他們一反曹氏父子「術兼名法」高壓政治，努力追求一種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並協助大將軍曹爽展開了一場以道家思想為指導的變革運動。

正始名士的領袖人物是何晏、王弼和夏侯玄，而聚集在他們身邊的則是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人，而正始名士對政治的巨大熱情正與這個名士團體人員的構成有著極大的關係。

何晏，字平叔，東漢末年大將軍何進的孫子，曹操「為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寵如公子」，「無所顧憚，服飾擬于太子」，「尚公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三國志》注引《魏略》）《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多宗尚之。」又引《魏氏春秋》：「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王弼，字輔嗣，出身于山陽高平王氏，有著一個自東漢便「世為豪族」的顯赫背景。《世說新語·文學》注引《弼別傳》曰：「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台郎。」

夏侯玄，字太初，征南將軍夏侯尚之子，「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正始時「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三國志·夏侯玄傳》）

這是有關正始名士三位原領袖人物的情況簡介，至於其核

心成員鄧颺、丁謐等人，《三國志》裏有一個較為集中的記載。

《三國志》卷九注引《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于京師。明帝時為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得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遷侍中尚書。……丁謐，字彥靖，……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稱其大可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有謗書，謂『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擋，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甚也。……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文，居處殷富。遷並州刺史。……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李勝，字公昭……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

通過以上記載可以得知，正始時期的名士不僅大多具有顯赫的家世，而且都是正始年間活躍於朝廷的達官顯貴，是在朝者，有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追求，是一個色彩鮮明的政治團體。《三國志·傅嘏傳》注引《傅子》曰：明帝太和之時「何晏以材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于閭閻，

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三國志·曹爽傳》曰：「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名聲，進趣于時，明帝以其浮華，抑黜之。」據此可見，早在魏明帝時期，這個團體就已經形成。由於他們交遊結社，聚會清談，「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三國志·董昭傳》）引起了一幫守舊之臣和魏明帝的反感，於是有了所謂「浮華案」的沉重打擊。而到了明帝死後的正始之時，大將軍曹爽為了在政治上與司馬懿為代表的老牌貴族勢力相抗衡，便將何晏、夏侯玄等這批遭受打擊的「浮華」之士招回朝廷，委以重任，於是也就有了正始年間以道家思想為指導的改革和魏晉玄學的出現。

考察正始名士就會發現，在他們的身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追求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在哲學的層面上爭辯、探討天人關係及萬物本體，而于「清談玄理」中顯一「逸氣」；二是熱衷於世俗政治，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努力破除「術兼名法」的高壓統治，建構一個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並在現實生活中擯棄傳統禮法，交遊結社、聚會玄談，追求一種無拘無束、輕鬆自由的生活方式。

在思想觀念和人生追求上，山濤與正始名士非常的接近，而從年齡上講，山濤也與他們基本相仿，其中只有何晏比他大了十多歲，而夏侯玄、王弼等則比山濤還要小。那麼，為何山濤當年沒有進入正始名士的圈子，卻要去與嵇康、阮籍等人把臂入林呢？我以為，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是由於家世背景的差別所致。

正始名士集團是由活躍於京城洛陽的貴公子構成的，而山

濤則出身低微，雖說他的父親山曜也曾當過「冤句令」，但這與何晏那批人的出身是沒法比的，更何況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已經去世。所以，儘管山濤從小就胸有大志，且智慧過人，但在門第思想已經很重的魏晉之際，他的出身決定他難免要受到社會的輕視。《世說新語·政事》注引虞預《晉書》曰：「濤蚤孤而貧，少有氣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表面上看，司馬懿說的是一句玩笑話，但實際上這玩笑也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而事實上，山濤也的確沒有引起司馬懿的重視，一直到四十歲的時候，山濤才步入政壇，「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晉書·山濤傳》）可以說，是山濤的家世背景使他與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失之交臂，而成了他們思想的繼承者。

與正始名士集團不同，竹林名士之間沒有世俗利益的關聯，沒有共同的奮鬥目標，其家世背景也各不相同，他們的聚集一起而形成一個所謂的「竹林名士」團體，完全是由他們彼此的志趣、才華、「風神」的相互吸引。《世說新語·簡傲》注引《晉陽秋》曰：「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悅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曰：『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晉書·向秀傳》曰：「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晉書·阮籍傳》曰：「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事實上，山濤也正是被嵇康、阮籍的才華、「風神」所吸引而走進竹林的。《世說新語·賢媛》曰：「山公與嵇、阮一面，

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如何？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當以我度為勝。」其注引《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群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

「度為勝」是山濤與嵇康、阮籍等人的最大區別，而所謂「度」，也就是對現實政治的精明和敏感。

《世說新語·賢媛》注引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說明同正始名士一樣，山濤也是一個熱衷於世俗政治的人。但是，在他生活的年代，朝廷內部鬥爭激烈，以大將軍曹爽為代表的新興貴族和乙太傅司馬懿為代表的老牌貴族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矛盾衝突，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陷入滅頂之災，所以山濤在熱衷於世俗政治的同時，也充分意識到政治的險惡，小心謹慎地應對著仕途上邁出的每一步。通過世人對山濤的評價就可以看出，山濤是一個對政治極其精明和敏感的人。王戎說：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裴楷曰：「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世說新語·賞譽》）以上的這些評語，不僅揭示了山濤的性格和人品，更重要的是揭示出山濤是一個深藏不露、精明過人的政治家。《世說新語·政事》注

引虞預《晉書》曰：「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世說新語·賞譽》注引《竹林七賢論》曰：「咸甯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永甯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欵起，皆如濤言。」事實證明，山濤的確是個對政治極其精明和敏感的人。

由於山濤心與正始名士貼近，所以，儘管他與嵇康等人把臂入林，但始終沒有放棄對世俗政治的熱情，等到司馬氏父子發動高平陵之變而控制朝政，朝廷鬥爭的結局已經明朗之後，山濤便結束了「隱身不交世務」的生活，從竹林中走了出來，利用「與宣穆皇后有中表親」的關係，跑去找控制朝政的司馬師。司馬師有些挖苦地說：「呂望欲仕邪？」遂「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晉書·山濤傳論》）

雖說由於家世背景的原因使山濤無緣進入正始名士的群體，但進入仕途之後的這位竹林名士卻成了正始名士在政治遺產上的繼承者，比較一下山濤與何晏這兩位都曾擔任過吏部尚書在任時的表現便會看出，二人有著驚人的一致。

何晏本來就對政治學說有系統深入地思考，且以道家思想作指導，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論，到他掌權改制時，自然是要把其理論落實到實際內容中去。何晏在其《論語·衛靈公注》